

■ 聚焦

热血犹映青山红

——读潘小平《大别山上》 □黄晓宇

岭横江淮,界分鄂皖,“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相传这是大别山的名称来源。大别山的“大别”固然在其景色,但更在于这片土地上战斗与生活过的人们。

这里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它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众多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山岭的阻隔、交通的闭塞,既使得大别山保存了革命火种,也阻碍了它的发展步伐。2011年,大别山区被列为农村扶贫开发集中连片困难地区;及至2020年,经过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人民的共同努力,大别山区终于脱贫摘帽,实现了壮丽新生。

大别山区日新月异巨大变化,不仅体现了祖国对革命老区的深情回馈,也是人民艰苦卓绝战胜困难的深刻缩影。描写时代新变,呈现时代新姿,记录时代面貌,讴歌时代成就,为千古伟业留存信史,为人民奋进唱响赞歌,正是当代作家所应肩负的时代使命。但大别山厚重如山的题材分量,天然赋予了作品壮阔恢宏的史诗品格,对创作者的笔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作家潘小平因《有一种红叫金寨红》等项目结缘大别山,近10年间多次深入当地的丘陵沟壑,大别山区的新变,他不仅是见证人,更是亲历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怀着对老区人民的赤忱,作者广泛采访扶贫工作人员与脱贫民众,积累了70余份细致的采访

笔记,在深厚的情感积淀与材料积累的基础上,以纸为石,以笔为刀,雕成了《大别山上》这方红色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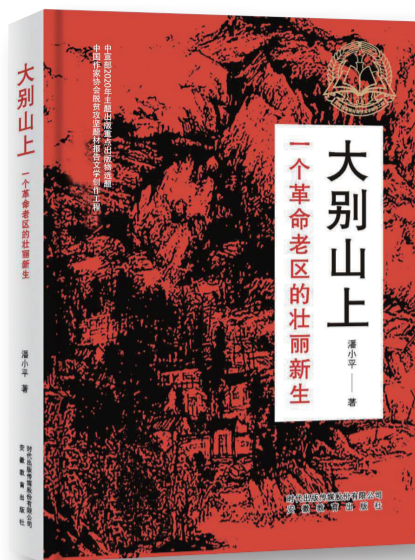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的近百年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百年沧桑中,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大别山区也留下了无数气吞山河的历史场景。本书在创作过程中,面对众多材料,遵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指示,目光始终聚焦于“人”之上,以当地一批革命志士后代的事迹搭建作品的主体框架,在几千年来始终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这一宏大参考系观照下,确定了扶贫开发所在的历史坐标,凸显了它足以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意义。本书行文中,昔日与今日每每同框并列,载籍文献的灾难记述、革命年代的舍生忘死与扶贫开发的筌路蓝缕交织交错,使阅读过程中充满光色斑斓、百感交集的体验,坚定了读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小切口,大视野”的写作风格,既让宏大历史场景在对比中展示出波澜壮阔的雄伟力量,还因充盈的人文关怀,而使本书极富艺术感染力。于是,在读到黄守群坚定为未曾谋面的红军丈夫冯伦奎持家守业,于48年后才得知冯伦奎已牺牲而痛不欲生时,读者足以在感性上真切地认识到,过去的人们如此艰难,却如此勇敢。在看到披肝沥胆的革命志士罗敏创作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于70年后仍在他的故乡流传时,读者也顺理成章地觉察到,红色的精神与心魂在

这片土地上一直赓续并将长久传承下去。“纪传体”而非“编年体”的书写,令作品中一个个个人形象变得鲜活,时代大潮淘洗出这些本是平凡人物身上的非凡精神闪光,读者在书中读到的既是他们的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作者对这片土地怀抱深情,故而笔下虽是具有普遍性的扶贫开发故事,但仍然写出了大别山区不同他处的风土人情,写活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百态。在开篇上,作者即精心结撰:“现在,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仅仅用此一句,便平地惊雷般将读者领入真切可感的山区生活现场,作者或运笔如椽,写意式画出立夏节起义、溧史杭工程的磅礴气势;或心如发火,工笔式描摹当地人家的小狗、鸡仔与板栗树等温馨家常。浩浩荡荡的时代巨潮与吉光片羽的日常生活有机地融成一片,对百年来的山乡巨变,读者如耳闻其声,如目见其成。

作者在后记中说:“在采访中,我并不过分关注扶贫工作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生活、情感、家族史、村落史上,感受环境、氛围、气息,尤其是人的变化。”本书完整地贯彻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作品中不但描写了金寨天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抱儿山、黑毛猪等这些显性的当地山川风物,更难能可贵,是以细腻坚实的笔触,绘出了作为库区、山区、革命老区的大别山区特有面貌,以及这块土地上人民独特的精神肖像,呈现了他



们的生命体验,展示了他们同时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困苦、坚定奋进的精神气质。可以说,本书既是一部堪当信史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心灵史”。

走过百年风霜雨雪,大别山区从贫穷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振兴。而在深情回眸这百年征程的今日,作者记录了这个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情景:冯纪耐手指指向对面树木茂盛的山坡,说道:“我看得见哩。”在那座山坡上,长眠的正是冯纪耐的养父、革命烈士冯伦奎。“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应当看月。”于是,我们顺着指向,也看见了代代流传的红色精神,看见了热血浸染、开遍映山红的“大别”之山。

当然,书中也瑕不掩瑜,如部分资料、数字虽属行文必需,但取用时段落较长,对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

厚积薄发结硕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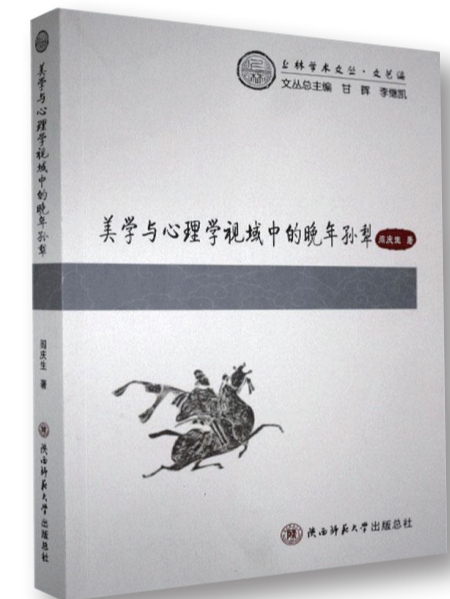
——读《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晚年孙犁》 □冯新宏

近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阎庆生的学术专著《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晚年孙犁》一书。此书50万字,是孙犁研究专家阎庆生先生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汇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可喜收获。

作为对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晚年孙犁研究》的增补本,此书的正文部分,增加了《孙犁的散文美学思想》一章和结语《应对孙犁的文学史价值进行整体性评估》。这就突出了美学维度的研究,并提升到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审视作家孙犁,增进了原书学理性的深度。另一部分是十多万字的《附录》,其中列入了作者后来所写的多篇研究孙犁的论文和短篇传记《晚年孙犁》。

《晚年孙犁研究》出版后,曾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少关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十余家报刊刊文对此书作了评论或报道,予以肯定。作家徐光耀、阎纲、杨闻宇,学者王富仁、张梦阳、程光炜、李跃力等人,都予以赞许。简言之,该书把晚年自孙犁一生中相对独立出来,从美学与心理学视野作了较深层次的阐释,雄辩地证明了孙犁作为思想家和散文大师的实绩,在祛除层层遮蔽的同时,为我们重构了一位血肉丰满、衰年变法、大器晚成的文学大师的形象。现在看来,在孙犁研究领域,阎著是敢于发人之所未言的。它把《书衣文录》作为孙犁晚年文学活动的起点,对孙犁的忧患意识作了历时性的贯通分析,对孙犁晚年的心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对孙犁美学思想的内涵、结构、特征及现代转型作了最初的、较为系统的探讨。在这些论题上,作者所论述的,皆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所得出的观点。

该书绝非旧书重版。此次的新版,篇幅不小的附录里所收录的论文,以美学思想为中心,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对原有成果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论孙犁“边缘生存”的人生哲学》一文,使原版中《在沉思中梳理人生哲学》一节的论述立体化了,含义更加丰富了,同时也为更为深入地探讨孙犁的美学思想夯实了学理的地基。长文《试论孙犁的人生性美学》从整体上对孙犁的美学思想作了较深层次的探索和定位,以孙犁美学思想对分别在一定时期较为流行的“生活美学”“政治美学”“实践美学”的三重超越,凸显了孙犁美学思想的独创性和内在结构。作者强调,这三重超越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交错重叠的。这一点足以见出孙犁美学的丰赡与品位之高。阎著比照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学界的论争状况,以充足的证据强调,孙犁的美学思想并不比一些专门的美学家的水平差、贡献小。作者指出:“当西方一些学者引颈东望,虚心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美学借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大作家,以其自身的学养和毅力,已经构建起了承前启后、多姿多彩的潜美学体系。”“他(孙犁)凭借的是认真研读文学名著,比较系统地、综合地汲取了中国古代大家的美学思想精华,并对自己和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作出总结。孜孜矻矻,呕心沥血,像蚕儿吐丝一样,竭尽全力在创作领域和艺术美学领域耕耘,终为大器晚成的巨匠!”应该说,阎著的视野是较为开阔的,而其论证是有理有据,扎实稳妥的,它摆脱了就事论事的窠臼,既比照了同时期美学界论争的整体水准,又总结了同时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解读徐光耀的“孙犁论”》《一桩搁置了三十年的诗坛公案》两文,其论述也都与孙犁的美学思想有关联,它们分别从不同层面拓宽了孙犁美学思想研究的论域。《孙犁的对话》一文,是作者与老作家阎纲的对话,在近距离的切磋交流中,为本书增添了思想火花和鲜活气息。《孙犁习作系列中的短篇杰构》一文,分析了孙犁在中学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麦田中》的艺术



特征,在打通孙犁的早期与后期创作的人道主义取向、重视语言锤炼等方面有所探索,这在评论界尚属首次。而短篇传记《晚年孙犁》一文起到了以感性形象印证理论阐发、激活深度思考的作用。作者视角独特,写法新颖,独具一格,鲜活活泼,是一篇别致而意蕴较为丰厚的散文。

本书的主体是以理论思维对孙犁美学思想的探索,没有专门的作品分析,但作者在《“耕堂文体”的艺术创造及美学风格》一章里援引了孙犁作品中的不少例子,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孙犁的作品实际,克服逻辑线索可能带来的抽象与生涩。据我所知,作者阎庆生业余写诗,偶尔也有诗歌发表。所以,他的研究文字,显得凝练、有情致,并不枯燥。读他的书,是我们又一次走进孙犁暗香浮动艺术天地。

总之,《美学与心理学视域中的晚年孙犁》一书,学理性强,命题较为密集,分析中肯,深入到了对象的精神层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恩格斯强调,要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全面考察文学作品,作价值判定。可以说,阎庆生在孙犁研究领域,方向明确,知难而进,着力于美学探讨,研究与自学相结合,旷日持久,有其独到的贡献,值得文学界关注。他认为,正因为为在现当代作家中,具有较为完整的美学思想的为数寥寥,所以,文学大师孙犁的美学思想,我们不能轻忽、令其湮没。孙犁一生崇敬鲁迅,自觉地学习鲁迅的思想、感情、文字,他的作品里流淌着鲁迅的乳汁。阎庆生前期著有《孙犁研究专著》,这是他研究孙犁的基础和凭借。他对我说过:由鲁迅到孙犁,由孙犁到徐光耀——这是鲁迅精神谱系的一个分支。徐光耀说自己是“远学鲁迅,近学孙犁”。这是肺腑之言,值得深思。

孙犁于2002年夏逝世,这十余年来,他的小说、散文不断地被选编出版,仅散文就有十余种,一本薄薄的《书衣文录》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这正说明了孙犁文学作品生命力的不寻常。一位老作家多次说到,过二三十年,孙犁的文学史地位还要提高。——文学史的眼光,正是在观察和评论作家作品时应该具备的。至少,在研究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学术方法论上,阎著为中青年学人提供了一些参考。一些想学习孙犁人品和文品的青年作家,也可从此书中得到若干启示。

著名学者王富仁对阎庆生的孙犁研究的评审意见,李跃力教授写的书评《祛蔽与重构》,都列入了该书《附录》,可供读者参考。王富仁先生在评审意见里明确指出,阎庆生的研究“极为扎实也极有意义”,我想,这不会是无根之谈。

向迅的散文集《与父亲书》显然有着书写一个真实父亲的追求。后记中,向迅坦言渴望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父亲”和“父辈的影子”,但却又承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饰的父亲,如实地写进文章里”。当父亲的形象难以自行呈现,当呈现父亲形象的主体动作落在“我”的笔头,向迅写出的,必然是他眼中真实的父亲。同时,向迅在书写父亲之时不断折回自身,“与父亲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为了一份“与自己书”,成为了写作者心灵的刻录与反省。

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家庭生活的艰难呢?在向迅这里,是“鼠患之年”。向迅生于1984年,在一个不断被叙述为“新启蒙”时期的黄金年代,向迅一家还在用玉米作为主粮维持生命的供养,与蚕食玉米的老鼠的斗争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鼠药、蛇、猫等各类灭鼠的举措不断考验着人鼠双方的智力与耐力。当令人心生恐惧的蛇在吞下老鼠的同时又将毁掉支撑着房屋的墙壁,父亲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捕蛇行动中,以双手,以牙齿。这是《与父亲书》中父亲最为勇猛的时刻,幼年的向迅在这一行动中见识了父亲裹挟着怒气的勇气和力气。那一条为了捕鼠钻进墙壁而被尖锐石头划伤,并未能在种满指甲花的花园中复生的大蛇显然给向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活的老鼠卡在蛇的食道,父亲的喉头滚动,像“一只幼鼠在爬动”。《独角兽》中,向迅多次以爬动的幼鼠比喻父亲的喉结。对自身疾病处于猜想之中的父亲欲言又止,“他喂养在喉结处的那只幼鼠又开始不安分地滑动了”。

向迅笔下的父亲,最为生动之处并不在于他从艰难的家庭生活或者疾病的苦难中的塑造,而在于他对父亲的塑造调遣了与他们生活所贴近的象喻,使得父亲与土地、与土地上最微不足道却又力量涌动的生灵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父亲青筋暴露的手臂、大腿“爬满了蚯蚓”,父亲犹疑不定的“眼神里也爬满了蚯蚓”。化疗给父亲带来高烧,“他的身体几乎烫得熟一筐土豆”。父亲为“我”写信,“要把那些散落于记忆深处、已经爬满青苔的汉字搬到信纸上,就贴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摸黑逮羊一样困难。他需要凭借顽强的毅力,才能把那些奔跑跳跃在无尽黑暗中的汉字一个个捕捉到,再使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它们穿连在一起,费力地赶上坑坑洼洼的道路”。

但是,笔尖可寻的贴切象喻并不意味着父子之间没有距离。大抵天下的父子都是如此,连续不断地不能打破的沉默的对峙,也发生在向迅和父亲之间。肿瘤,长在父亲的肺部,也梗在向迅的心头。父亲是否重病的疑团始终在飘浮,向父亲分享单项检查报告的好消息,向父亲隐瞒医学诊断的最终结果,然而父亲必从小心泄露病情的助理医师那里获知了恶性肿瘤的真相。

比对疾病本身的质疑更为直击心灵的是治病的办法,父亲是否曾怀疑,“是不是我们兄妹不想凑那样一笔费用,才宣称他不适宜做手术?”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当向迅回忆起父亲的病程,这个问题的提问对象,与其说是父亲,不如说是“我们”。如果父亲的病程允许手术,“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拿出、拿出得那么一笔颇为巨额的钱来延长父亲的生命?这是将父亲的生命与“我”未来的生活置于同一天平的自我诘问。即使,在父亲治病过程中,这一问题事实上是虚构的,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手术,但在书写父亲的过程中,向迅经历了这样一次真实的诘问。

这样的诘问是否同样发生到父亲身上?或许比向迅的自我诘问来得更早,在自己的生命和孩子未来的生活之间,父亲是否同样经历过挣扎?父亲挣扎之时,他喉头的幼鼠是否在不停地滚动?父亲意欲推心置腹与“我”沟通失败之后,他听从了“我”关于治疗的解释。关于疾病,父亲不再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可言说,或者亦无需再次言说的真相带来巨大的沉默。巨大的沉默将父亲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整日整夜,父亲似睡非睡,他以此抵抗疾病,或许也以此面对他的孩子们。

当“我”领会沉默中的信息,沉默的对峙开始显露出可供沟通的可能之时,父亲已经不在。很难说得上这种错开时空的理解究竟是无效,还是超越了时空。或许于父亲而言,只能遗憾为无效,又或许如向迅所说,“在他对生命彻底绝望之前,他就选择了原谅我们”。无需沟通,在父亲的心中,不只与“我”,与“我们”,乃至与整个世界都已经达成了解,沉默对峙之时的壁垒在父亲的心中不攻自破。于向迅,穿越时空的领悟绵延不断地加深了对父亲、对人生的理解,使他的写作长久地难以绕开父亲,由父亲而抵达人生的其他角落。

《巴别塔》或许意欲塑造父亲暴怒、隐秘,甚至孱弱的一面。父亲和母亲之间无休止的吵架,父亲受伤之后母亲承担起供养家庭的重担,父亲与婶婶的琐事……“父亲昔日身体里的那头具有变色龙某些属性的狮子,在某个神秘的夜晚,踏着阑珊月色,抛弃旧主,投靠了母亲。”然而,母亲说,“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遇见过比他更聪明的人。”“聪明”,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以此来形容自己的丈夫,显然有异于向迅着意呈现的“父亲”。

“祖母在园子里忙碌,撒着生养了七个儿子的屁股。”“祖父和祖母都不爱父亲”。“四叔要结婚了……五叔要结婚了……六叔要结婚了……”“婴儿不停地出生……”“不被允许的事情还有很多……”“父亲好几次差点死于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繁衍异常苦难,又异常坚韧。《时间城堡》中,不断重复的句子或相似的句子回环往复,不仅为散文的某些段落带来了古久的可以吟咏的调子,而且不断强调着父亲一生的苦楚,“父亲的一生,像是个孤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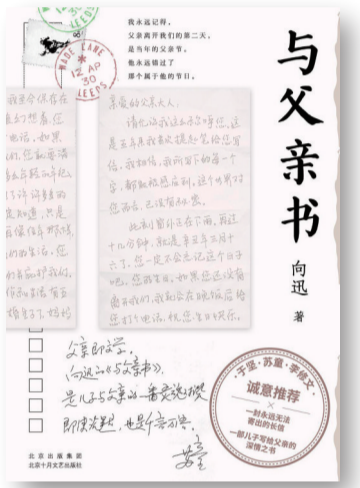
“我”眼中丰富,难以穷尽的父亲,在别人的眼中,是否也是“无名之辈”?由父亲而与“无名之辈”,所呈现的是向迅的写作观。他写占有石矿却十分慷慨,相赠曾有过官职并救过许多人的日先生,质疑的是无名之辈是否真的碌碌平庸。他花力气回顾范文写作者与云哥之间的恩赐与被恩赐,在对恩赐者自得自满的批评中质疑范文写作者的写作姿态,同时质疑被恩赐者是否真的是虚弱让人怜悯的弱者。他在凯的落魄与积蓄的反差中观察乡邻,包括自己家人关于凯的玩笑中包含着的刁焉不察的嘲笑,“他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成为了那样一个人呢?”向迅或许对已有的答案并不感到满足,究其原因,大致是他承认凯拥有别人,连同自己都无法潜入的精神世界。

“怎样写与我们总是充满着隔阂的父亲”,这个问题再扩大,便是怎样写我们却保持持着距离的芸芸众生,再从写的对象折回写的行为主体,“我”赫然而立。写父亲,必然也是在写“我”,进入父亲的生命,必然也在进入“我”的来路,进入“我”精神世界的沟壑。

怎样写与我们充满隔阂的父亲

——读向迅《与父亲书》

□闫东方



词语照亮的人生

□雨眠



了沉重和悲伤,但同时也不断地为回忆的火花所明亮,于微茫而苍凉的人世,感觉到活着的满足和支撑。

一部分则和远方有关,如《瓜州月》《五台山礼佛记》《黄河上游》和《汉江落日》等,李满强主要写他天南海北旅游之时的所见和所思。区别于一般读者的旅游感想抒发,李满强这一类的写作,一方面是对异质山水特征的发现和感喟,脚步不停地移动,在眼神不断地被吸引之时,他一次次地将自己扔出去,于不断的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自身也忘情于异域的山水,将身心藏匿的病痛予以清空,修复自己被现实所损伤的心灵。一如《明月月》一诗所写,“作为众多深谙迷途中的一个/我曾挟裹着一十三省的风暴与雷霆/也曾积攒了四十余载的顽疾与虚火/当我缘着栈道,亦步亦趋,提心吊胆/终于来到太平顶”,“我确信,在明月山之巅/我嗅出了内心潜伏已久的淤血/而不远处,那十二群峰鼓掌作答”;一方面是一些学者反求诸己,在主体不断的对象化之时,同时也不断地将对象主体化,借助于诸多陌生风景的观照,清晰自己的内心,澄明自己的诉求。“沙粒那么多,我数不清/沙丘那么高,我翻不过去了/你看身后的脚印,都被风收走了//那躺下吧,在这荒诞之地/什么都不用去想了,和众多的沙粒在一起/等待一次盛大的落日”(《天边》),或者“是的,你看/当我说到了落日,汉江两岸的/秦岭和巴山,那粗犷的双肩/就猛地一耸”(《汉江落日》),不断的风景的变换,通过对其中的自我镜像的审视,诗人因之不仅发现了自我的缺陷、问题,而且也清晰了自己的需要和诉求。

通过认真的反思,李满强逐渐于他的诗歌写作之中,熔铸了更多的理性成分,在观物同时观己之时,使其表达因之有了鲜明的审视意味。看、发现、探索,或者干脆的或直接或间接的“镜子”意象,超越具体的词语表达,他的诗歌里似乎始终都明晰着一个“审视者”形象,看也回看,让外部的观察,不知不觉就悄然成为内部的反思。

一面镜子或者一种审视,呈现所见但同时呈现眼睛,我由此格外欣赏《萤火与闪电》一书中所收集的那些具有“与”和“对”类意思的诗,在这些作品里,看别人,同时也看自己,随物宛转而又与心徘徊,在自己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倍显表达的张力。

因为这样的原因,读完李满强《萤火与闪电》中的所有作品,合书反刍,我想无论是萤火还是闪电,它们其实都应该是一种眼睛。